

资本主义治理术的逻辑运演及其批判

马俊峰 张彦琼

(西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 730070)

提 要: 在资本的空间裂变与重组之中,资本主义治理术在空间场域的变革中发生改变,从“工厂实体”伸展到“工厂实体”空间外,再发展到虚拟数字空间或者“数据平台”,这一时空逻辑的演进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所带来的客观上的历史进步,毋宁说是资本权力主导下的治理术机制逻辑运演方式发生变革。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资本权力将人们从复杂的血缘关系中抽离出来,在工厂实体空间中用“攻身为上”的治理术将生物性生命打造成一个个可被驯顺的肉体。在金融资本主义时期,伴随着经济体金融化方向的转向和生产方式的非物质转型,资本主义治理术溢出工厂,并在“工厂实体”空间外实现了对生命在日常生活中的生产性重塑。进入虚拟数字空间或者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据资本权力这一新形式得以产生,它完美地实现了资本主义治理术的数据化更新,将原本对主体显性的塑型转变成隐性的包括从“攻身为上”到“攻心为上”的全新治理技艺。伴随资本主义治理术的逻辑演进,主体的身体和精神均沦为巨大治理术的产物。正因如此,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展开对构成资本主义治理术深层的数字权力予以批判,揭露资本与权力布展的社会结构对人的抽象统治,从而在“人的解放”视域中思考人的发展问题。

关 键 词: “工厂实体”;“数字平台”;资本主义治理术;主体

中图分类号: D0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22)02-0092-08

“治理术”是福柯在生命政治学研究过程中使用的概念,构成理解与思考生命存在的一种理论视域。可以说,他基于权力的理解采用“治理术”一词来重释自古希腊起至现代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历史发展,聚焦权力形式与主体塑型之间的关系,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治理术所处理的东西是作为主体的人,这个人不仅是知识的产物,更是权力的产物。而欧洲两千多年的文化发明了诸多塑造主体的权力形式,基于对这些权力形式的分析,一种独特的权力话语理论视域便由此形成。具体看,这一理论视域就是将权力与主体借由“治理术”相勾连,架构起以“权力—治理术—主体”为框架的批判方法,即权力微观光谱分析的谱系学模式。此分析路径是西方政治哲学界自罗尔斯开启对正义理论的建构运思后的再一次复兴和转向,特别是此分析模式在18世纪的生命政治转向,俨然使整个西方政治哲学的框架出现了深刻的改观。然而,要厘清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的微观治理秘密和主体之间的真实关系,就需要我们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最深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进入马克思的“资本”概念窥视资本主义治理术的运

演逻辑。我们看到,马克思留给我们的理论资源,其本身就蕴含了权力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他这里的权力并非是作为超越权威的政治权力,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具备“支配一切”的资本权力。如何正确认识资本权力主导下的资本主义治理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同时期的运演逻辑?不同时期的治理术是否具有代际间的谱系传承?如果有,那么不同时期的生产方式与治理术谱系运演之间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主体是如何在资本主义治理术的运演过程中被制造出来?并被制造成了怎样的存在?这一系列问题的存在,使得在平台数字资本主义的时代显得更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意义。

一、工业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治理术在“工厂场域”的出场逻辑

工业资本主义是基于工厂空间场域所建构起来的生产性社会,这样的社会组织结构服务于资本逻辑,为了资本增殖,不惜采用物化的治理方式维系资产阶级统治,资本以其抽象支配一切,从而从资本支配中产生的统治手段与方法演变成为维护工业资本主义的治理术。

(一)工业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治理术的初步形成

17世纪以前,“治理”概念一直被放置于一个较为宽广的背景之下。“治理”一词不仅在政治领域中被讨论,在哲学、宗教、医学、教育学中也受到重视,涉及的问题从国家管理到自我管理,从对孩子和教育到灵魂指导。依于此,福柯将“治理”定义为“对行为的引导”^[1],一个从“自我管理”到“引导他人”的术语。然而,随着18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整个西方治理史出现了明显的分水岭,欧洲自古希腊时期一直延续的传统权力谱系出现了断裂,呈现出“从规训的权力到调节的权力,从消灭恶到利用恶,从公共管理到自由放任”的转变^{[2]8}。换言之,这个时期产生了新的权力模式,在原有惩戒的基础上附加了对主体的生命调节性治理,政治的目的开始转向对生命的投资,这个新的权力就是将治理对象聚焦于人口上的生命权力。“人口”在这里也已不是主权权力下的被统治对象,作为一个“新的政治概念”成了国家的核心问题和国家力量的源泉^{[2]6},成了一个可被关注、了解、统计和调节的对象。用阿甘本的话来说,此时的人口具有了生命政治的概念,并被纳入政治治理的体系之中了。当面对的不再是主权权力,而是治理术的时候,人口作为生命权力的治理对象就得以建构起来,这就形成了以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治理术。生命政治实质上就是一种权力治理术,“人口”作为生命政治的关联物 and 对象,其本质就是政治权力将所有可能的生物性生命纳入治理对象,对“人口”生存境遇的关切根本上就是对所有可能的生物性生命的关切。自此,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将主体生物性生命纳入人口组织政治技术的治安实践。

然而,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还是自洛克到黑格尔的近代政治哲学家对确立现代社会规范性目标的探讨,乃至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新建构,以及福柯的微观权力视角转向,他们都不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他们的反思并未触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原动力,换言之,犹如齐泽克所说言“资本的残酷的逻辑”“资本的幽灵”,这个幽灵以大他者的身份出现,在所有象征性大他者的传统化身均告解体时仍然起作用^[3]。其实,福柯的思想中一直活跃着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下来的隐性遗产。福柯把自己的权力微观物理学分析模式扩展到了马克思视域下的国家宏观结构,以此解读主体形成与统治形式之间的关系,并借由“治理”问题的研究重新开始窥

探权力变迁的现象。正如莱姆克认为的,对于福柯而言,“国家在他的理论中代表了一种负面的参照,但现在却处于他的分析重心”^[4],这是政治领域的“哥白尼革命”,这就意味着国家不再是权力的来源与基础,而治理构成国家良好运行和构序基质,治理从事物配置转向对人口治理。而在这样的认知层面上,福柯与马克思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在谈论治理术的时候,已然摒弃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有鉴于此,福柯并不是一个革命者,而仅仅只是一个反抗者。

马克思实现了权力问题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完美会通,在市民社会中精准把握了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权力与主体的互动关系,以此表达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具体而言,他在黑格尔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进行分离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头足倒置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颠倒过来,并在其中发现了人类历史的真正基础和普遍规律。马克思认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方式就是市民社会”^[5],它是全部历史的真正舞台。因此,马克思基于政治哲学的智慧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完成了对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内容的市民社会中统摄、支配一切权力内核的分析与批判,指认这个内核就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权力。然而,这一权力是如何形成的呢?自18世纪以来,以工厂、大工业为特征的工业资本主义重塑了整个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彻底革新了传统以使用价值为主要目的的生产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追求交换价值和资本增值的生产。与此同时,大量脱离土地的“自由人”被迫从复杂的血缘关系中抽离出来,转变为去技术化的“无产者”。当资本具备了从货币那里继承下来的购买力去购买这些“无产者”后,在实质上获得的就是对“无产者”的使用权和支配权,这种资本对劳动(力)的工具性使用就是资本所具备的权力。自此,劳动力开始在无形的生产工具规训和经济剥削中受制于资本权力这一抽象的统治与支配。

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使用过“治理”或“治理术”的概念,但其对作为市民社会中权力内核之资本权力的图绘,以及对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生命的关照完全可纳入资本主义治理术的问题体系。因其涵盖的对诸如权力、市民社会、国家、主体等问题的探讨与治理术的相关概念实现联姻,它们共同指向的不仅是权力对主体的强制性影响,更是将主体看作是权力机制的效果和结果。可以这么说,资本权力在马克思的视域下绝不是传统形式的权力,而是一种具有生命政治性

的权力,其目的不再是惩戒和杀戮,而是治理,最终人将被打造成迎合资本权力的更为有用存在。因此,较于福柯,马克思从市民社会中的资本权力和现实的人出发更为彻底地切中了主体的生物性生命境遇和生存方式,他不仅把脉了以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为内容的权力机制的原动力,更是在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显性制度的替代方案,而这些恰恰是福柯乃至传统政治哲学家没有涉及的。

(二)资本主义治理术在“工厂场域”中的“攻身为上”布展

在整个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时期,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主要指向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而在其中同样蕴含着关涉生命权力的治理术批判视域。从劳动力如何成为商品,资本如何具备对劳动力的支配权力,再到资本权力对劳动力身体进行“攻身为上”的治理,乃至资本权力与科技合谋下对身体的彻底的规训,可以揭开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生命政治治理术的秘密,这一秘密的发生场域是工厂实体空间,运行的物质根基是机器生产代替手工业生产的技术基础。我们看到,与传统的君主所行使的处决的权力不同,生命权力技术是赐生的权力,它的功能不是去杀戮,而是去实现对生命的完全利用,从而将其变成顺从性肉体,这是将对肉体的政治干预和经济使用紧密相连的“肉体的政治技术学”^{[6]28},是由一套形形色色的工具和方法形成的治理技术,它们将肉体作为一种劳动能力塑形成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的有用的力量。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工厂场域中肉体塑型的起点。劳动本是劳动主体生命的自由自觉行为,且并不总是劳动力,但是却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在进入工厂场域中,变成商品化的劳动力。在工厂的生产领域,商品化的劳动力从“自由人”成为资本权力的奴隶,从此,资本权力便展开对劳动力“攻身为上”的肉体塑型。在工厂这个最为典型的全景敞视监狱式的组织中,诸如严格的工作纪律、周详的生产时间表、严密的劳动监控机制、精细化的分工劳作流程等治理手段的实施,其实质都是对劳动力肉体的塑型,最终就是要借由对肉体的塑性达到提高生产效率,实现资本增殖的目的。马克思将这个蕴含生命政治治理机制的全景称为“温和的监狱”,在其中,“资本权力对工人肉体的劳动动作施加了微妙的强制,从姿势、速度和熟练程度等方面来掌握它,这种微妙的强制在精细化作息的掩盖下变成了一种不间断的、持续的强制”^[7]。更为可怕的是,对肉体的这种不间断、持续的强制还

进一步被局限在了被分解成许多独立部分的局部劳作中,以至于工人们只有通过协作才能生产出一个完整的产品。虽然在流水线劳动过程中,整体的生产效能得以大大提高,但工人完整的肉体也随之被肢解成只能进行某一简单操作的片面肢体。

对肉体“攻身为上”的治理技术是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和加深的。资本主义不断向前发展的工业化进程不仅对肉体进行驯服,更是将肉体支配到机器旁,对其实施与机器大生产相适应的全面矫形术。架起产业化进程与肉体矫形术的桥梁便是代表劳动资料的技术,“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8]。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代表劳动资料的技术在发展中尽情展现其正面价值的同时,更布展起一套对劳动力肉体的治理机制。在马克思看来,工厂中的生产活动本是认识人的本质的基本途径,人的本质也只有在劳动、生产、工业以及它的历史演变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然而,以技术为基础的工业所代表的物质生产活动却对肉体形成了一套偏离人的本质的矫形与治理机制,而资本权力作为原动力恰恰成为推动此机制运行的幕后推手。资本权力不断推进技术发展,劳动资料作为过去的死劳动,“它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9],活劳动就在这个相对的过程中被矫形成死劳动下的驯顺肉体。特别是当自然科学“不费分文”地被资本权力用来进行一次次技术改进并投入生产后,一个个驯顺的肉体又被矫形成剩余、过剩的肉体。他们与不断改进的机器同时被资本权力放在物的层面上展开竞争,结果就是“人权通过物权中介,物权表征人权,人成为一个不如物的无名之人”^[10]。

二、金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治理术溢出“工厂实体”的演进逻辑

资本在空间裂变中外向发展,促使资本对自己进行重组,从而把自己的触角伸展到金融领域,占据主动地位,成为金融中的主体,以便更好地完成价值增殖的使命,进而不仅在宏观方面,更是在微观层面加深对资本控制客体的压制与盘剥。

(一)资本主义经济转型与资本主义治理术的进一步发展

想要分析资本主义治理术在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转向以及其对主体的新塑型,首先需要对资本主义经济呈现的新趋势和生产方式的新变化做一个基

本背景分析。自20世纪初开始,资本主义的主要经济体便开始朝着金融化的方向发展,经济活动的重心也随之从工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自此,工业资本主义开始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权力的实质掌控权也落入金融资本之手。列宁在马克思和希法亭研究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金融资本理论,他认为:“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进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进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11]金融业原本是作为调节资本流动、方便市场交换,并更好地为生产和消费提供融资服务的,是寄生性地依附于产业资本,并服务于生产性劳动的存在。然而,随着金融部门中货币技术服务功能的深化和发展,产业资本和资本积累对金融市场的依赖程度加深,最终,金融的血液渗透进物质生产乃至非物质生产领域,并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起到强大的控制与统治作用。这种强大的控制不仅表现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形成上,更是呈现在资本权力在非物质劳动领域的渗透上。尤为重要的是,在非物质劳动领域,金融主导下的资本权力探寻到了壮大自身、榨取更多财富的空间。

“非物质劳动”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们针对资本主义经济转型下的新变化,并借助对马克思关于“一般智力”概念的考察而提出的新的概念。尽管马克思所处的年代生产非物质化商品的劳动已经存在,马克思本人也对“非物质生产劳动”这一概念有所涉及,但这个数量微乎其微,不足以和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形态的生产形式相抗衡。而恰恰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对资本主义转型的新形态分析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下劳动的变化形式。他们认为,在对整个经济发展模式所产生的影响力来看,这个阶段传统“物质性”因素的劳动霸权地位已逐渐被智力化、信息化的“非物质”因素所取代。继而,从产业资本中分离出来的诸如生息资本、借贷资本等虚拟性资本不仅越来越普遍地服务于物质劳动生产领域,更是在非物质劳动生产领域蔓延开来。当然,对于提出非物质劳动概念的学者哈特和奈格里来说,“非物质劳动”也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他们更愿意将其称为“生命政治的劳动”,因为非物质劳动并没有脱离劳动的物质性,“它既包括我们的肉体,也涵盖了我们的精神,它的非物质性是就其产品的直接形态而言的”^[12]。

资本积累面向金融运作的转向以及生产方式的非物质转型,共同推进了资本主义治理术的进一步演

进。那么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转型阶段,透过金融资本的拜物教意识形态和非物质生产方式的转变,如何才能进一步揭开资本主义治理术演进逻辑的秘密呢?我们看到,金融资本主导下的治理术在此阶段已开始从“工厂实体”溢出,并向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其扩张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增强和加深。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生命的塑型技术不尽相同,与此同时,人的活动方式、人的社会关系、人的消费方式都必然随之改变。在以物质生产方式为主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由于规训权力对身体的矫形技术过于粗糙和压抑,因此它无法带着自己隐藏的愿望进入主体除了肉体之外的其他层面,矫形技术发生的场域也难于突破封闭的工厂围墙。

然而,在金融资本主导下的新阶段,资本权力借由非物质劳动的“经济基础”地位,已开始突破工厂围墙,逐渐在社会结构的每一个神经末梢延伸,在主体身体的最深处弥散,甚至进入主体的灵魂和意识。那么它是如何实现这种弥散性的延伸呢?作为包括以生产观念、形象、情感或社会关系为主的非物质劳动,显著特点就是头脑和身体因素的共同参与和运作,通过信息与通信交往系统直接组织大脑与身体行为,直接进入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身体行为,并将原本工厂中对生命外部的规训转向内部控制和善诱,以此达到重塑生命的目的。同时,非物质劳动生产出来的非物质产品依旧会反过来统治人,并规定人的劳动,这就导致了非物质劳动已不再指向创造和创新,而更多地只是为了迎合资本权力的需求。资本主义治理术的演进与发展恰恰就隐藏在这种迎合资本权力需求的新的劳动形式中,不仅对身体进行着工作中流水线上的规训,更重要的是,在非生产时间的日常生活碎片中依旧有意识地引导或善诱人们向权力所强调的方面进行思考和消费,最终,劳动力在工厂围墙外的生活日常中再一次被榨干,他们自己却对此一无所知。

(二)资本主义治理术对工厂实体外空间的生命塑型

资本主义治理术不仅以在工厂中的生物性生命为对象,更是以工厂实体空间外的、日常生活中的生命为对象。如果说在工厂场域中,展现出的是一种以“肉体的政治技术学”为基础的压抑性权力治理术,那么在工厂实体空间外,则更多体现出的是对生命在日常生活中的生产性维度,是一种将个人塑型与权力相关联的治理技术。在其中,个人成为“规训”的特

殊权力技术所制作的一种实体,权力则从压抑特质转为生产特质,“我们不应再从消极方面来描述权力的影响,如把它说成是‘排斥’、‘压制’、‘审查’、‘分离’、‘掩饰’、‘隐瞒’的。实际上,权力能够生产”^{[6]218},这便是哈特和奈格里指认的生命形式生产。他们扭转了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生命政治治理术的主题,将权力的消极特性转向了生命的生产性,这种基于生命主体的观察视角显然是对福柯的超越。从权力的压抑特质到生命的生产维度的转变恰恰就发生在工厂实体空间外的日常生活领域,这一点被列斐伏尔敏锐地捕捉到了,他在马克思关注的工厂劳动过程之外,看到了资本权力对劳动力日常生活的延续性盘剥,看到了人在微观化的日常琐碎中的进一步异化。然而,资本权力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奴役绝非压制和强制的,相反,具有了生命的生产性特质,它借助生命本身的力量和潜能,能动地实现了对人更隐蔽的控制,于是,这就成为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甜蜜的苟生。

在金融资本和非物质生产为主导的社会关系中,生命的生产性首先表现为日常生活中“透支消费”生命体的生产。消费本是“经济领域与日常生活领域进行交换和沟通的渠道,是资本与日常生活实践相结合的领域”^[13],然而却背离了这个初衷。随着资本积累逐渐走向金融化和实体经济增长的停滞,面对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资本权力有意制造出追逐商品的虚假欲望。正如马尔库塞指认的,资产阶级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从外部不断制造虚假需要以刺激人们违背真实的内心意愿去购买商品,满足这种需求或许会使个人感到十分高兴,但这样的幸福会妨碍认识整个社会的病态并把握医治弊病的时机^{[14]6}。尤其是这种违背真实需求的虚假消费还会被金融资本裹挟成为“透支消费”需求,透支消费不但没有改变劳动者依附于资本的事实,而且使资本在获得更多剩余价值的同时,将生命生产成更加弱势的透支消费体。换言之,劳动力不仅在工厂流水线上被固定的一系列治理技术所强迫,更是在工厂实体空间外的日常生活琐碎中被继续诱导,这也是瓦纳格姆指认的当代资产阶级谎言史上最为陈旧的观念,即“消费社会中显示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景观”^[15]。然而,资本权力还不仅限于此,为了增加日常消耗,还向人们许诺一个需要用分期付款来购买的福利,这样,劳动力作为消费者,不光是现在,甚至连未来的收入和利息也被资本无情地摄取。加之在非物质劳动不断建构的新虚假消费需求的助力下,生命的生产性完成了透支消费的普通虚假消费

到炫耀性消费的升级。在这里,生命彻底依照金融资本主导的权力形象来理解和生产自身。

除此之外,在金融主导下的非物质劳动进一步加速社会两极分化的基础上,劳动力生命被固化在了麻木且丧失超越性的底层序列,这是关涉生命的生产性治理的另一层体现。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增长规模以及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秉性是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和无产阶级相对贫困的原因,这一原理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仍具指导意义。由于资本越来越多地借助于金融体系等手段来实现自身的增值,大多数劳动力由于缺乏科学技术和生产资料越发地陷入了贫困与失业境地,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特别是那些底层劳动力,彻底被固化在了底层序列,更别说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了。我们深知马克思对人的需要层次的指认,他认为,“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16],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人的需要将由低级层次向高级层次发展,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的最高层次需要,即“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资本权力溢出工厂之后,确实借助电视、电台、广告等传播媒介对日常生活中的人进行了新的生产,各类治理技艺也无孔不入地侵入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时间,正如上文所述,他们已被重塑成虚假消费诱导下的透支消费体。但是,为了让劳动力不再追求自由、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资本权力会费力借助各种治理技术使他们沉浸在暂时的舒适之中,甚至动用福利国家政策让他们生活的相对富裕,以保证他们肉体上不消失,能存活下来,这便是甜蜜的苟生。结果就是“由于人们批判的、否定的、超越性的和创造性的内心向度的丧失,人们似乎根本不会再提出或想到要提出什么抗议”^{[14]4},更何谈实现人的全面本质占有和全面自由发展了。此时的生命已在日常生活中被永久地生产成麻木且丧失超越性的底层生命,成了只能甜蜜苟生却不能生活的无用阶级。

三、平台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治理术在“平台场域”的更新逻辑

伴随资本主义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资本使得数字丧失了原本计数的中立立场,开始对人的盘剥与施虐,而数字资本则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社会与人变得透明,这从根本上加深了对人们的控制与操纵。

(一)平台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治理术的数据化更新

进入21世纪,资本主义开始步入平台时代,这是

一个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数字平台为依托的新兴经济形式的时代。尼克·斯尔尼塞克将这个时代定义为平台资本主义时代,将这种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构建的新型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过程称为“平台资本主义生产”。他认为,“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发展重心在于提取和使用一种特殊的原材料—数据”^[17],海量的数据必须依赖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来进行记录和分析才有用,鉴于此,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应运而生,这便是平台经济。“平台通常由处理数据的内部需求而产生,并成为一条有效的途径,能独占、提取、分析和使用记录下来的日益增加的数据量。”^{[17]49}而数据作为平台经济的核心资产,是生产、创造、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平台经济新的生命线,它们将给市场带来超级能量,给公司带来巨大压力,使金融资本的作用大大削弱。当数据哪怕只是部分地承担了货币的角色时,金融资本就会失去其大部分意义。在今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数据正在代替金融成为核心资源,而对这些核心资源进行提取和控制的平台则成了新的产生利润的手段和资本积累的途径。

虽然数据和平台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但同样免不了被资本权力褫夺的命运。当资本权力与数据联姻,数据资本权力这一新形式便得以产生,为资本主义治理术的数据化更新奠定了前提和基础。在利用数据创建的平台世界,资本权力已不再需要实体产业和金融业为其拓展的空间去获取利润并布展对生命的治理技艺。原本全景敞视下的工厂和工厂实体空间外的资本主义治理术在平台时代有其局限性和缺陷,德勒兹和鲍德里亚都分别对这种局限和缺憾性做了说明。德勒兹认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生命政治模式的衰退,互联网革命后产生了一种新的控制方式,“在新的当代社会中,你不需要外部控制,因为个人对自己进行控制”^[18]。同样,鲍德里亚也认为在虚拟数字领域中,原先在边沁的全景敞视中的外部观察过程已被转换,他认为,现在我们在没有任何外部观察的情况下展示了我们的图像。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成为外在的图像被展示出来,当一切变得可见且没有秘密时,观察者和图像之间就没了距离。的确如此,当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缺乏距离时,整个地球都在变成一个数据化全景,变成一个没有围墙把里面和外面分开的透明社会。因此,资本权力在透明的数据全景社会必会将青睐的目光转向数据。特别是与云计算等数据算法结合后,更是在创造出更巨大利润的同时,获取到了影响和治

理平台场域下主体的目的。那么,在平台时代,原先在工厂中和工厂实体空间外的种种治理技术必将让位于数据治理术,为了与这种数据治理术相契合,是否会形成一种新型的治理对象或主体呢?

答案是肯定的,平台时代数据治理技术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数据治理技术面对的不再仅仅是传统的生物性生命体,而是超越现实世界,由精准的数字图绘产生的“数据人”和大量真实存在的免费劳动力——“数据佃农”。数据人是经过对现实中自然人的种种主体特征的数据采集后,再由数字图绘技术形成的精准图绘,“我们可以将这种经过精准的数字图绘产生的人叫做数据人”^[19]。虽然数据人只是现实人在平台上的一个图绘,一个虚拟的存在,但对他们实施治理技术的目的就是要借由掌握数据人在平台的主体特征、行为倾向,从而对其进行潜在的引导和干预,最终这些引导和干预会反过来影响现实中的人。当然,这部分治理在巨大的数据治理技术框架中所占据的比例并不大,真正占主导地位的治理对象是那些真实存在的免费劳动力——“数据佃农”。“数据佃农”是尼古拉斯·卡尔依据平台资本主义时期新变化提出的概念。从本质上看,任何让用户产生内容,并且以营利为目的的平台,实际上就是把它们的用户变成了数据佃农,需要缴纳“地租”,基于此,这些数字佃农们却不拥有他们生产内容的所有权,而公共数据就变成私人财富。正因如此,他们只好接受这种隐性的治理。在数据平台时代,不得不承认,几乎所有生命都被纳入了数据治理技术的框架,变成了平台上的数据佃农。那么数据治理术到底是怎样展开其布展技巧从而使这些治理新主体心甘情愿地被纳入?最终,他们又被重塑成怎样的存在了呢?

(二)资本主义治理术在“平台场域”中的全新拓展

平台资本主义时代已不再是产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时期的“攻身为上”治理术时代,它正努力向着“数字化精神政治时代前行”^{[20]16},在这个新的时代,平台掌控的数据成为十分有效的治理工具,深入进主体的心灵、精神层面,对主体施加从包括“攻身为上”到“攻心为上”的全新打造。伯纳德·斯蒂格勒是最早将“精神力量”这个词作为理解平台资本主义时期新概念提出的,他认为权力已不再是前平台时代的外部力量,而是精神力量这种新的内在控制形式,它是促进了福柯生命政治的进一步发展。“现在

的问题不再是将人口作为生产机器加以控制,而是将人口作为消费机器加以规训;问题已不是生命政治,而是作为动机和规训的精神力量。”^[18]因此,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资本主义社会在数据资本权力的推动下所要克服的“不再是来自肉体的反抗,而是要去优化精神和脑力的运转程序”^{[20]33},实施对生命全新的调节和矫正。生命被彻底分解成数据而失去意义,“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统治术就这样开始其吸纳人的精神领域的征程”^[21],以顺从、友好的形式将自己装扮成自由,使主体完全丧失警觉,陷入自由的假想中。

面对全新的资本主义数据治理术,几乎所有生命都被纳入其中,被诱惑地陷入“自由”的假象中而成为平台场域下的数字佃农。从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出发分析平台时代的治理术,可以发现隐匿在平台背后的新型权力结构关系,即“数据资本权力”与“数字佃农”之间的关系。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平台推动了数据资本的积累和数据资本权力的生成和扩张。在平台时代的社会经济关系中,谁拥有数据和信息,谁就掌握了权力,谁就得到了获取经济价值的权力。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数据资本权力往往被那些拥有大量信息和数据的少数大型平台企业所有,从大量免费劳动力所创造的经济价值中获利,而这些免费劳动力才是信息和数据的自主创造者。平台只是赋予了劳动力生产工具,可他们却不拥有他们生产出的东西的所有权。更为可怕的是,与传统的强制性权力范式不同,数据资本权力具有非强制性特点,是一种友好型权力,打着为主体好的旗号控制着主体的意志,通过善诱、诱惑性技术使主体对它产生精神依赖,而并非让他们变得顺从。可以说,数据资本权力使得资本主义治理术从显性转向隐性,特殊转向普遍,部分转向整体,表层转向深层,一切服从无形的数字资本权力支配,使得资本成为占据与支配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力量。

正因如此,数字佃农就被数据平台时代的治理术矫正成自我剥削性的存在,用自己所谓喜爱的方式将自己“压垮”。而数据资本权力以无形力量促使主体在“自由劳动”的幌子下实施“自我剥削”,以此加固资本的榨取和统治方式的。“平台给每个人分配一小块虚拟土地,让他们在这块土地上耕作自己的数据作物,比如发布文字或照片,然后平台会利用这些数据作物来吸引广告,赚取利润。”^[22]一般来说,数字佃农作为隐性存在者,无法感受到数字本身对自我构成剥夺或者剥削,相反,他们非常乐意地进行这种自我展

示性的自由劳动,自愿让自己裸露在外,自愿把所有可能被利用的数据放到平台上去。其实,数字佃农并非为自我的需求,而是为数字资本在工作,平台使他们陷入一种精神愉悦的假象,他们以为在跟别人分享自己的想法、兴趣和观点,但事实上他们是在为运营这些平台背后的资本工作,“资本产生的是它自己的需求,我们却将此误认为是自己的需求”^{[20]9}。人们被一步步诱导着通过侵占自我时间和空间的方式而尽最大可能地提升剩余劳动,他们向自己发起了侵略,这种面向自己的侵略与剥削比他者剥削更有效率,功能更为强大,而相较于平台来说,是对借助资本联合起来的集体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全面占有。总之,数字佃农们在平台经济中忙得不亦乐乎,全天候处于数据劳动状态,而平台公司则在现金经济中如鱼得水。此时,资本权力没有再用那些前平台时代人们所憎恨的治理术矫正生命,而使自己伪装成人们所喜爱的模样,在引诱人们无限制地追逐财富、成功以及流量的幌子下,将他们重塑成不断向“幸福”生活奋斗的自我剥削者,最终,生命在虚假的美好幻象下变得不堪一击。

四、余 论

今天,身体和精神已经陷入资本权力构序下甜蜜生活的魔掌之中,早期被葛兰西称之为“隐性霸权”的东西也已成为弥漫在所有生命中无法穿越的迷墙。如何使迷失的身体和灵魂从迷墙中摆脱出来,如何在高速发展的平台时代创造出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如何超越资本权力掌控下的治理术而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跃迁,这一系列问题的探究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在批判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在批判资本主义治理术的基础上找到可代替的新型治理方案。虽然平台时代已几乎将所有生命都纳入巨大的数据治理术框架中,但这并不意味着生命只能被动地被其矫正成它们希望的模样。实际上,我们同样可以在飞速发展的当下看到突破资本主义治理术壁垒的可能性。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恰恰为我们的探究提供了这种可能和希望,当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蕴含实践逻辑基础上的有效尝试。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可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扬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旨趣,由此,资本只能作为一种要素参与到现代化道路的建设中来,只能服务和从属于人民,资

本权力的非理性特质必将得以限制。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以人民为中心”与“共同富裕”高于资本权力特有的财富增值本性,更高于资本权力的贪婪嗜性。因此,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进一步将私人数据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性数据,坚持利用、控制、服务相统一的方式,可以规避资本权力的非理性效应。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在通过打造多元共治的治理体系来重塑一种平台时代生命的存在方式,这是一种以人的尺度,而非以物的尺度促成生命自我建构的治理方式,它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愿景指明了方向。当然,要彻底建构起超越资本权力的、以共同生产能力为根基的、人的自由个性得以全面实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参考文献:

- [1] Thomas Lemke. Foucault, Governmentality, and Critique [J].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ethinking Marxism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Amherst (MA), 2000(9): 21-24.
- [2] 米歇尔·福柯. 安全、领土与人口[M]. 钱翰, 陈晓径,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3] 齐泽克. 敏感的主体[M]. 应奇, 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413.
- [4] 莱姆克. 马克思与福柯[M]. 陈元, 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7.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87.
- [6]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 [7] 马俊峰, 张彦琼. 马克思生命政治批判视域中资本与劳动的内在张力[J]. 理论月刊, 2021(5): 31-38.
- [8]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210.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463.

[10] 马俊峰. 《资本论》与“过剩人口”的生命政治[J]. 山东社会科学, 2018(4): 51-57.

[11] 列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39.

[12]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M].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109.

[13] 王宁. 消费社会学: 一个分析的视角[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1.

[14]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刘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15] 鲁尔·瓦纳格姆. 日常生活的革命[M]. 张新木, 戴秋霞, 王也频,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48.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130.

[17] 尼克·斯尔尼塞克. 平台资本主义[M]. 程水英, 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45.

[18] Manuel Cruz Ortiz De Landazuri. Psychopolitics and power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ought[J].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 2019(2): 1-12.

[19] 蓝江. 数字文字学和算法治理技术: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再生产[J]. 山东社会科学, 2021(3): 25-32.

[20] 韩炳哲. 精神政治学[M]. 关玉红,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21] 孙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精神政治学”[J]. 求索, 2020(4): 63-71.

[22] 尼古拉斯·卡尔. 数字乌托邦[M]. 姜忠伟,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3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空间中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叙事话语建构研究”(21VSZ127); 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生命政治批判研究”(20YB028)。

作者简介: 马俊峰(1969—), 男, 甘肃张家川人, 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彦琼(1982—), 女, 甘肃张掖人, 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包米尔; **校对:** 琉璃